

《与吴质书》中的生命意识

姜卜丰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国际教育学院，北京

收稿日期：2026年7月20日；录用日期：2026年8月13日；发布日期：2026年8月25日

摘要

《与吴质书》是曹丕书信作品中的代表篇章，蕴含着深刻的生命意识。文章以《与吴质书》为研究对象，结合汉末建安时期社会动荡、疫病频发的时代背景，分析曹丕生命意识的形成原因及具体表现。从曹丕对逝去友人的追忆与评价入手，探讨其在面对生命消逝时产生的感伤与思考；同时，结合“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文学观念，分析曹丕试图通过文学创作实现精神不朽的价值追求。《与吴质书》中的生命意识既体现了对人生短暂、世事无常的深刻认识，也表现出通过文学创作和建功立业超越生命局限的精神追求，具有鲜明的理性色彩和重要的文学价值。

关键词

《与吴质书》，曹丕，生命意识，文学，不朽

The Consciousness of Life in “A Letter to Wu Zhi”

Bofeng Jiang

School of Global Education & Development,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Received: July 20, 2026; accepted: August 13, 2026; published: August 25, 2026

Abstract

“A Letter to Wu Zhi” is a representative epistolary work of Cao Pi and contains profound reflections on the consciousness of life. Taking “A Letter to Wu Zhi” as the research object,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formation and manifestations of Cao Pi’s consciousness of life within the historical context of social turmoil and frequent epidemics during the Jian’an period of the late Eastern Han dynasty. Beginning with Cao Pi’s remembrance and evaluation of his deceased friends, the paper explores the sorrow and reflections he experienced in the face of the transience of life. Meanwhile, based on the literary concept that “literary works constitute a great enterprise for governing the state and an

immortal achievement”, the paper analyzes Cao Pi’s pursuit of spiritual immortality through literary creation. The consciousness of life embodied in “A Letter to Wu Zhi” reflects not only a profound understanding of the brevity of human existence and the impermanence of worldly affairs, but also a spiritual pursuit of transcending the limitations of life through literary creation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achievements. It demonstrates distinctive rational characteristics and significant literary value.

Keywords

“A Letter to Wu Zhi”, Cao Pi, Consciousness of Life, Literature, Immortality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与吴质书》是曹丕致好友吴质的一封信，也是其重要的文学代表作。该文深刻折射出曹丕的人生态度、思维方式及理想抱负。基于此，本文以《与吴质书》为切入点，深入剖析曹丕的精神内核，探寻其内心的所思所虑。

《三国志·魏书》裴松之注有载：“二十三年，太子又与质书”([1], p. 1646)，可见这封信作于建安二十三年(公元 218 年)。在此之前，曹丕已有与吴质的书信。为区别二者，一般称较早一篇为《与朝歌令吴质书》(或《与吴质书》)，称此篇为《与吴质书》(或《又与吴质书》)。为避免混乱，本文所说的《与吴质书》皆指建安二十三年曹丕所作书信。

吴质，字季重，因文才出众被曹丕喜爱，且在曹丕被立为太子的过程中出谋划策，立下大功，与陈群、司马懿、朱铄并称为“太子四友”，同当时文人“建安七子”交往密切。

在这封信中，曹丕强烈的生命意识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这种生命意识与当时战乱频发、疾疫肆虐的时代背景密切相关。它以对生命价值的审视为精神内核，寄托了建功留名、实现“不朽”的热切期盼。在这里，建功既作用在现实政治上，又作用在“经国之大业”的文学创作上。

现有研究多从文学史意义或曹丕文学思想的角度分析《与吴质书》，而对于文本内部“生命有限性意识”如何转化为“文学不朽追求”的精神机制关注不足。本研究试从生命意识生成、文本表达方式以及精神超越路径三个层面，对《与吴质书》进行阐释。

2. 曹丕生命意识的现实根源

写信的日期二月三日，是隆冬已过、春意渐兴的日子。身在邺城的曹丕，也因春日来临，心绪翻涌，更加想念自己已经久不见的老友，故而写信抒怀。“岁月易得”提纲挈领：岁月骛过，流光易逝，这是曹丕认清的现实，也是由衷的慨叹。曹丕回忆与吴质分离的时间，已是三年有余、将近四年了。“书疏往返”一笔带过二人近四年来不曾断绝的书信沟通，体现曹丕对友人的关怀，侧面印证二人友谊的真挚。

信中所说“昔年疾疫”，指的是汉末时期的大疫。接连的疫病，削弱了民众对“生”的希望，影响了社会整体心态。根据《三国志》《后汉书》等史书的记载，东汉建安年间发生了多次大规模疫病：

建安十三年(公元 208 年)：“权闻熹至，乃走。公至赤壁，与备战，不利。于是大疫，吏士多死者，乃引军还([2], p. 89)。”

建安十四年(公元 209 年):“军数征还,或遇疫气,吏士死亡不归,家室怨旷,百姓流离([2], p. 89)。”

建安二十二年(公元 217 年)的大疫,情况则更为惨烈。曹植在《说疫气》一文中描述道:“建安二十二年,疠气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3], p. 262)。”

疫病最直接的后果是致人死亡。曹操成为丞相后,在其根据地邳城,招揽并构建了稳定的文人集团,后世称之为邳下文人集团。陈琳、刘桢、王粲、阮瑀、徐干、应瑒等人,都聚拢在曹氏父子身边。在统一北方后,曹操又封曹丕为五官中郎将,曹植为平原侯,命徐干、刘桢为五官中郎将文学,应瑒为平原侯庶子,允许王粲、陈琳、阮瑀等与曹家兄弟平交为友。这些文人在政治上追随曹氏父子,在创作上与曹氏父子互为欣赏并切磋,形成了一种较为独特的统治者与文士亲近的局面。在文学作品中,曹丕将徐、陈、应、刘、阮、王等六人与建安早年的名士孔融并举,即后世所说的“建安七子”。

“建安七子”除孔融外,都与曹丕有过亲近交游;而除孔融于建安十三年为曹操所杀、阮瑀于建安十七年病死外,徐、陈、应、刘、王皆死于建安二十二年(公元 217 年)的大疫。

在一年后的早春,曹丕回想起过去一年中数位好友因病去世,顿生感伤情愫。冬去春来,寒冷时节本是疫病易发、致死的高峰期;而春日渐近,自己和未罹疫病之灾的亲友又“熬”过了一年,这何尝不是一种希望?然而,曹丕在对未来抱有希望的同时,难免又流露出对过往逝者的深切哀恸。从中我们可以感受到,曹丕的生命意识中潜藏着难以言明的痛苦与矛盾。

曹丕曾经认为“百年已分”,自己与诸子可“长共相保”,待好友去世后才醒悟到这种想法的荒谬,言道“数年之间,零落略尽”。曹丕的这种行文范式与生命意识,对魏晋文人产生了深远影响。同样以生命哲思为核心的名篇——王羲之的《兰亭集序》中,“固知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殤为妄作”([4], p. 43),便与其有着高度的精神共鸣与相似之处。这是在疫病流行的时代背景下,将人类的“无知”与天道的“无常”置于同一角度,承认了人的认知与客观现实间的巨大差异。在这里,曹丕不是沮丧的,这缘于两方面:一是“百年已分”未能实现,二是“长共相保”未能实现。前者失败是后者失败的充分条件:人的寿命都不能得到基本的保证,更何谈感情的维持。曹丕用“零落略尽”来描写朋友的离去,给人一种人如落叶般凋零的沧桑无力——这像是在描写秋天:曹丕已步入中年,到达了人生的秋天;故友凋零,则为曹丕创设了心灵上的秋天。曹丕承继了屈宋的悲伤情绪,认为秋天是萧瑟肃杀的。如《燕歌行(其一)》中,“秋风萧瑟天气凉”([5], p. 390)一句,一笔奠定了全诗基调,亦印证了曹丕对秋之看法,其中渗透着浓烈的生命意识。

“疾疫”不仅构成《与吴质书》的现实背景,更改变了曹丕对于生命持续性的认知。好友相继死亡,使原本基于友情和时间经验形成的稳定预期被打破,从而促使曹丕由个人怀友之情转向对于生命有限性的哲学思考。

3. 从悼友存文到文章不朽:曹丕生命意识的精神超越

曹丕详细地回忆了自己的故友。他着眼于文章角度,而非从人品、德行等角度立意,再次印证了曹丕浓厚的“文章不朽”观念。“七子”之中,除孔融外,曹丕对六人皆有评价。徐伟长胸怀文墨、恬淡寡欲,可谓德才兼备,他的《中论》文辞典雅,能传于后,可以实现“不朽”;应瑒文采焕发,有创作之意,可惜有生之年其愿未能实现;陈琳的奏章疏表写得很出色,只是有点词采烦冗;刘桢的作品纵横奔放,只是还没达到强劲有力的程度,而他的五言诗则超过了同时代的作家;阮瑀的书札、奏记文辞优美、笔锋轻捷,读之使人愉快;王粲以辞赋见长,可惜他体质孱弱,不能很好地展示他的文采,他的好文章,古人也不能超过……([5], p. 236)曹丕凭借自己高超的文学才华,以及对好友的深刻了解,客观准确地评价了诸位好友的文学风格。他对徐干、阮瑀几持全面肯定态度;对陈琳、刘桢的不足之处予以说明,既把握了主要方面也没有忽视次要方面;对应瑒、王粲持惋惜态度。曹丕有一句“间者历览诸子之文,对

之流泪，既痛逝者，行自念也”，陈述了他编辑诸子文章时的真实感受：既对故友逝去悲伤，也哀伤于自己终究有一天也会死去。这是全文“生命意识”最简单直观的体现，更与曹丕编辑诸子文集的动因相映衬。因此，在有限之岁创不朽之功，更被曹丕所重视。这是生命意识在文学领域的体现与延展，是使个体生命得以“延长”的另一种方式。

《与朝歌令吴质书》和《与吴质书》，虽创作时间、缘由各有不同，但在感情的传达上不乏相似之处。“每至觞酌流行，丝竹并奏，酒酣耳热，仰而赋诗”([5], p. 235)，与《与朝歌令吴质书》中“高谈娱心，哀箏顺耳”([5], p. 230)相似，是对往日“南皮之游”的追忆。主从一行已渐入佳境，推杯换盏，管弦齐鸣，酒意涌上，曹氏兄弟与诸子相对作诗。这是何等放浪自在之事啊！曹丕慨叹：“当此之时，忽然不自知乐也！”人在经历快乐时，总是不能准确体会到自己有多么快乐，往往也会对身处快乐的时光不甚珍惜，待到旧日快乐无法重现，才幡然醒悟原来过去之乐何等可贵，这便是“当时只道是寻常”。这个道理容易明白，但一定是需要重大变故才能让人刻骨铭心。如果不是好友去世，曹丕也很难彻底感受到往日之乐的珍贵。这便是“死”的力量。“死”不是虚无的，逝者已去，生者往往会通过逝者之死，增添精神力量，促进自身成长与改变。逝者之“死”，是替生者“死”了一次，让生者领会到身处纯粹的“生”之中所不能领会的东西。从这个角度上理解，死亡经验并非仅意味着生命终结，同时也转化为生者重新认识自身存在价值与意义的重要契机。这便是曹丕生命意识的独到之处。

曹丕为去世好友编录文章。“观其姓名，已为鬼录”([5], p. 235)，这是物是人非的感叹。文集编撰成册，曹丕凝视扉页，其上既是文章作者的姓名，又是逝去好友的姓名，心中五味杂陈。诸子的诗赋或多或少都有留存，曹丕将它们集录成册，主要有三方面原因：其一，怀念故友。见字如面，看到故去好友的文章，能排遣心中的殷切怀念。其二，使诸子身死而“不朽”。徐、陈、应、刘等人皆为文人，其文学作品若能传之于后，则虽身死而名可垂于竹帛。这是前人未曾设想的道路，即凭借文章获得千载名声。前代的观念，大抵多是“文章小道”——以文章留名于后是不值得夸耀、不值得追求的。但曹丕打破了这一常规认知，他知道自己故去的好友有文章之才，故使之文章成集，希望能以文章得到“不朽”。其三，通过编录一本“不朽”的文集，笃定自己“不朽”的决心。曹丕是希望自己“不朽”的，因而推己及人。下文的“而此诸子，化为粪壤”，则是“朽”的层面——人的肉身终将腐朽，化为土壤，化为“朽质”。“朽”与“不朽”的差异，是曹丕不懈努力的认知根源。在《典论·论文》中，“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5], p. 327)，是曹丕“文章不朽”观的集中体现。这一观念，是曹丕的生命意识在文学方面的写照。

曹丕对“不朽”的执念及其“文学不朽”观念的形成，与其父曹操有着密切的渊源，二人在人生理想上具有高度的相似性。此外，曹丕文武兼通的发展方向也深受曹操教导的影响，这主要得益于曹操本人便是一位才华出众、武略盖世的英杰。曹操少时虽任性好侠，不修学业，但后被举孝廉，入京都洛阳为郎，不久被任命为洛阳北部尉，开启了仕途生涯。在《让县自明本志令》(即《述志令》)中，曹操言年少举孝廉之后“欲为一郡守，好作政教以建立名誉，使世士明知之”([6], p. 41)，故在任秉公执事，得罪了十常侍而去官归里。后曹操被征为都尉，便更欲为国家讨贼立功，“欲望封侯作征西将军，然后题墓道言‘汉故征西将军曹侯之墓’”，这是他的本心。其后封侯拜相、平定天下，人臣之贵已极，仍言“荡平天下，不辱主命，可谓天助汉室，非人力也”([6], p. 42)。曹操虽被后世看作是厉行改革的法家代表，可其出身与发迹对其一生志向的影响决定了他终究在儒家“忠君爱国”的思维范畴内。曹丕则自幼便接受曹操以儒家君子之礼的严格教导，不仅文武双全，而且博览经传，通晓诸子百家学说。同时，在曹丕少年时期，曹操已历任司空、丞相，掌握中央决策大权，并在历经十余年战乱后，依然稳固地控制了北方局势。曹丕不似曹操般步步发迹，而是与其他世家子弟般出身于高门，具备参与政坛和文坛的条件。这位曹家公子、世族儒生，自幼便有儒家匡君辅国、平定天下之志。而儒家思想对文人、士阶层最大的

吸引之处，莫过于实现“三不朽”——《左传》中曰：“‘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7], p. 1328)。”“立德、立功、立言”，都是试图摆脱肉体上的局限，实现精神上的永恒。曹丕早就从生死中体悟到长生不老是不可能的，人必须要面对死亡的降临。既然肉体上无法达到永生，那么在精神领域能否实现不朽呢？儒家学派指出了三条途径，让曹丕深以为然：崇高的品德可以令人世代传颂，建功立业可以让民众长久受益，精妙的言论也具有永恒的价值，故而都能使人超越短暂的、生理上的“生命”，恒久地“活”在人世间，这正是儒家“三不朽”的价值取向。

在曹丕之前，所谓的“文学”远远排在经学之后。扬雄直接说汉赋是“童子雕虫篆刻”([8], p. 16)，甚至长于辞赋的曹植也说“辞赋小道，固未足以揄扬大义，彰示来世也”([3], p. 227)。曹丕则将“文章”的地位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在《典论·论文》中，他对“文学”不吝夸赞之辞：“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故西伯幽而演易，周旦显而制礼，不以隐约而弗务，不以康乐而加思。夫然，则古人贱尺璧而重寸阴，惧乎时之过已。而人多不强力；贫贱则慑于饥寒，富贵则流于逸乐，遂营目前之务，而遗千载之功。日月逝于上，体貌衰于下，忽然与万物迁化，斯志士之大痛也”([5], p. 327)！”这是《论文》中最令人动容的一段。曹丕将文章与年寿、荣乐相比，此二者都有结束的时候，但文章却可以不朽。文章创作本身可以让人不朽，这是一条最光荣的不朽之路，因为无所依傍，故而古来人所共重。人的肉体生命有限，所以才反衬了精神的价值。在有限的肉体生命中创作追寻无限的精神价值，这才是不朽真正的意义。曹丕拥有这般气度和思想，已经是那个时代最富个性的表现了。因此，他的“文章不朽”，实际上也就是“人的不朽”，人的个体生命在一定层次上也就跳出了时间的限制。

魏晋南北朝时期，战乱频繁，疫病流行，朝不保夕的现实境遇激发了所有人对“个体”以及“个体意识”的关注：个体明天可能就会消失，为什么不趁现在就展现自己独特的存在呢？《古诗十九首·生年不满百》所言“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9], p. 42)，真切地反映了汉末以来人们共同的心理状态，无论是帝王将相还是寻常文士，必然会通过自身的个性留下痕迹。在《世说新语》中，有这样一则故事：“王仲宣好驴鸣。既葬，文帝临其丧，顾语同游曰：‘王好驴鸣，可各作一声以送之。’赴客皆作驴鸣”([10], p. 621)。”王粲病死，而其生前最爱驴鸣。驴鸣，就是学驴叫。用今人视角观之，学驴叫是个怪诞的行为；而在当时，驴鸣与时人视为风雅的“啸”有相当之处，是魏晋风度的行为体现之一。王粲逝世时，曹丕正担任五官中郎将这一朝中要职。他亲率宾客，在葬礼上以这种独特的方式送别挚友，此举不仅彰显了曹丕内心的细腻与对友情的珍视，更折射出他对生命的深切怜惜。

七子、四友与曹丕交情之深厚，可以用《与吴质书》中“连舆接席”一词概括。曹丕虽是丞相之子，并长期担任五官中郎将一职，但在政治上多得诸子相助，且曹丕较为年少，与诸子在政治上皆为汉帝、曹操之臣，故与诸子呈现出平交的特点。在历史上，以“南皮之游”为代表的曹氏父子和邺下文人共同出席的饮宴盛会，正是“行则连舆”、“止则接席”式的主从和乐、其乐融融。一“行”一“止”，主从一行皆不曾远离，故而曹丕感叹，在诸子未亡时，他们“何曾须臾相失”！时至今日，我们仍将在宴会等场合坐得近看作二人交情深厚的标志，更何况在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如今“连舆接席”也早已变为成语，成为无数后世朋友友谊的见证。

4. 《与吴质书》生命意识的文学价值

《与吴质书》中，不乏精到的用典。例如，曹丕在文章伊始，就有“三年不见，《东山》犹叹其远，况乃过之”([5], p. 234)。”《诗经·豳风·东山》有言：“自我不见，于今三年”([11], p. 313)。”讲的是征人离乡之愁苦。古代文人善于比古，常以古人之事与自己相比，借以传达相似情绪。曹丕谈到《东山》诗

中主人公离乡三年都深感心悲，更何况自己与老友分别将近四年呢？曹丕对时间是无比细腻敏感的，文中“岁月易得”、“数年之间，零落略尽”等处，无不在通过时间词汇强化流光可惜、生命不可逆的观念，令人慨叹。

再如，曹丕在回忆旧友时，引用了两个春秋时期的典故：一是伯牙子期知音之交，二是孔子与子路亦师亦友之交。他写道，“痛知音之难遇，伤门人之莫逮”，这何尝不是在说自己呢？诸子死后，知音不在；而旁人之中，再无如诸子般文采斐然之人。说“诸子未及古人”，是因为古人已留名，实现了“不朽”，而诸子的“不朽”尚未完成；说“自一时之俊也”，是因为诸子较同时期的人，更具有实现“不朽”的能力，这是曹丕对他人的期盼。而对于自己，曹丕援引了汉光武帝的例子。汉光武帝刘秀，在乱世随兄起兵，攻灭王莽，又用十余年荡平天下，复兴汉室，为汉延祚近两百年。曹丕在《与吴质书》中，有些羞愧地说：“光武言：‘年已三十，在军十年，所更非一。’吾德虽不及，年与之齐([5], p. 239)。”十分谦逊地说自己德行、功绩比不上光武帝，可惜年岁已与之相当了。在这里，曹丕虽年未四旬，即便在寿命短暂的古代也算不上步入老年，但在彼时曹丕的身上，确能窥探出无力的迟暮感。曹操逝世时，其幼子曹干年仅五岁，而曹丕也不过三十有四。尽管曹丕自幼历经艰难的夺嫡之争，是一位深沉内敛的政治家，但面对这位幼弟，他却流露出了十足的关爱。正因如此，曹干面对大自己三旬的皇帝长兄，常呼“阿翁”。《魏略》记：“良(即曹干)年小，常呼文帝为阿翁。”曹丕中年时，便已白头，幼弟曹干如此称呼，与此不无关系。每每闻此，曹丕则会无奈地说：“我，汝兄耳([1], p. 1587)。”初为天下主、未有建树但已年近四旬的曹丕，在思索古之年少有为的贤良帝王时，年寿上的苍白感与无力感，在其心中会被晕染得分外清晰。今人每读之，仍会被文字中蕴含的生命意识所触动而深怀感慨。

《与吴质书》通篇，虽主要内容是对往昔事件的追忆与思索，但并非简单地沉浸在过往时光之中。行文至最后，曹丕笔锋一转，终于将陈述对象转换为当下自身，把一腔慨叹倾诉给朋友。曹丕说，他年岁渐长，因青年时随父征战，再加上经历了与其弟曹植长期的夺嫡斗争，身体的健康状况不容乐观——“时有所虑”、“通夜不眠”、“志意不复昔日”皆是其衰弱神经的写照。“以犬羊之质，服虎豹之文；无众星之明，假日月之光”([5], p. 239)，紧促连贯的对偶短句，解释说明了曹丕心中的想法：自己目前达到的位置，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父亲，而不是通过自己实现的；权力、地位，在自己眼中更非不朽。“动见瞻观”描述了自己成为魏国世子后的真实状况：自己的一言一行会被父亲按继位人的标准要求，一举一动也会被天下人共同关注，所以更加战战兢兢，不敢有丝毫闪失。身处权力中心后，曹丕的心理压力和生命焦虑可见一斑。曹丕与其弟曹植相比，本就更为隐忍慎勉，长期夺嫡生活已残害了其心灵与神经，而真正晋位世子后并没有得到放松，这让曹丕对自己的健康问题更加明了，故发出“恐永不复得为昔日游也”的慨叹——斯人已逝，年华已去，自身再也不是当初那个有父亲庇护、朋友陪伴的曹家公子，而是一个即将主导政局的、成熟的政治家。年轻的确是有特权的，年轻时可以不管不顾，可以神采飞扬，也可以个性张狂。少年时的烦恼，如今已不是烦恼；少年时的快乐，曹丕却再无可能体会到。故有了“少壮真当努力”的肺腑之言——它表面上是对老友吴质发出牢骚、叹息，感慨年华易逝、人生蹉跎、功业将由后人完成，实则是对天下后生、文士的由衷劝勉。这与“后生可畏”遥相呼应，再度点明年少时期便为实现身后“不朽”而努力自勉的必要性，传达了紧迫的生命意识，有理性的、发展的辉光。曹丕对后人给予了沉甸甸的敬意与殷切的期盼，流露出了淡淡的哀伤——因为自己与老友恐怕无法看到后人建功立业，实现不朽。这不是担心被超越的狭隘，而是在认清肉身必将“朽”之后，无法见证更伟大“不朽”诞生的失意。这是一种明明白白的痛楚。张若虚《春江花月夜》中，“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望相似。不知江月待何人，但见长江送流水”([12], p. 47)，便有着相似的精神意旨：年轻的生命，终将站在已经凋零的生命的肩上，去看到更远的未来，创造更伟大不朽的事业。字里行间，也颇有刘禹锡“暂凭杯酒长精神”的意味了。

曹丕的生命意识为后世文人所接受,其提出的“生命短暂”与“精神延续”的关系问题,在后世文学中得以持续讨论。例如李白《春夜宴从弟桃花园序》中,“浮生若梦,为欢几何?古人秉烛夜游,良有以也”([13], p. 1590),几乎是对曹丕的直接引用:李白宴饮族中诸弟,将其文采比为谢惠连,而惭愧自己没有康乐之才,抒发了对后生奋发进取的劝勉。不过,曹丕与李白虽然都意识到人生短暂,但二者对于生命有限性的回应存在明显差异。曹丕生活于汉末乱世,其生命意识建立在死亡频发和政治竞争的现实基础之上,因此更强调通过建功立业和文学创作实现精神不朽,具有鲜明的历史责任意识与功业追求。李白则生活于盛唐时代,其生命意识更多源于对个体存在和人生无常的哲学体悟,因而选择以诗酒、审美和自由精神回应生命短暂。前者试图通过创造“不朽”超越生命局限,后者则通过体验生命丰富当下存在,二者共同体现了中国文学中面对生命有限性的不同精神路径。由此可见,曹丕的作品与观念对后世文学的深远影响。

5. 结语

综上观之,《与吴质书》中,曹丕既对逝去好友进行了追忆与品评,又与生者好友共勉,传达了人生有限、早立功业的信心。《与吴质书》通篇,有着强烈的生命意识,闪烁着理性的辉光。其叙事方式与抒情模式,也成为后代文人创作书信体文章的学习对象,垂范百世。《与吴质书》中的生命意识虽然源于曹丕个人的友朋离散经历,但其背后反映的是建安文人在乱世环境中普遍存在的生命焦虑。战争、疾病与政治动荡不断强化士人对于生命有限性的认识,也促使他们重新思考个体存在的价值。因此,对曹丕生命意识的研究,不仅有助于理解其个人文学思想,也能够进一步揭示建安文学由社会现实体验走向主体生命表达的重要转变。

未来研究可进一步结合曹操、曹植以及建安诸子的相关作品,探讨不同文人在死亡经验、功业追求与文学创造之间的差异;同时,也可将《与吴质书》置于汉魏六朝至唐代文学发展的长时段中,考察中国文学中生命意识由“追求不朽”向“审美生命体验”转变的历史过程。

参考文献

- [1] 杨耀坤, 揭克伦. 三国志·魏书(五) [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20.
- [2] 杨耀坤, 揭克伦. 三国志·魏书(一) [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20.
- [3] (魏)曹植. 曹植集校注(上册) [M]. 赵幼文, 校注. 北京: 中华书局, 2016.
- [4] 吉发涵, 王平, 李绪洙, 等. 中国古代散文: 三上文库·卷 5 [M]. 济南: 山东大学出版社, 1997.
- [5] (魏)曹丕. 魏文帝集全译 [M]. 易建贤, 译注. 贵阳: 贵州人民出版社, 1998.
- [6] (汉)曹操. 中华国学文库曹操集 [M]. 中华书局编辑部, 编. 北京: 中华书局, 2012.
- [7] 郭丹, 程小青, 李彬源. 中华经典名著全本全注全译丛书: 左传(中) [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8.
- [8] (汉)扬雄. 扬子法言译注 [M]. 李守奎, 洪玉琴, 译注. 哈尔滨: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2003.
- [9] 隋树森, 集释. 中国古典文学基本丛书: 古诗十九首集释 [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8.
- [10] (南朝宋)刘义庆. 世说新语译注 [M]. 张万起, 刘尚慈, 译注. 北京: 中华书局, 1998.
- [11] 祝敏彻, 赵浚, 刘成德, 等. 诗经译注 [M]. 兰州: 甘肃人民出版社, 1984.
- [12] 王启兴, 张虹. 贺知章、包融、张旭、张若虚诗注 [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6.
- [13] (唐)李白. 李白集校注 [M]. 瞿蜕园, 朱金城, 译注.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0.